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Wenxue Yanjiu Fanwenhua Xianxiang Pipan

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

■ 姚朝文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Wenxue Yanjiu Fanwenhua Xianxiang Pipan

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

■ 姚朝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 / 姚朝文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9

ISBN 978-7-5426-2900-5

I. 文... II. 姚... III. 文学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667 号

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

著 者 / 姚朝文

责任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徐曙蕾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4

ISBN 978-7-5426-2900-5

I · 398 定价: 29.00 元

摘 要

当前,国内外的文学研究都呈现出泛文化的趋势,确而言之,它是指对文学的研究跨越出传统文学的领域,采用传统上看来属于非文学的研究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的思想文化趋向。对这种发展趋向的研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就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这里首先需要明确区分文学泛化中的两类情形:一是文学制作的泛化,二是文学研究的泛化。文学制作的泛化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形态、新样式,这些新型的“杂文学”样式有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手机短信文学,等等。但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并非对这些新文学样式的研究,它走得更其遥远、阔大。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为,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基本上是特指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现象,除非特殊情况下的文学制作活动产生了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或命题。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往往指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性别研究、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狂欢理论与广场文化等理论言说。本课题将不讨论文学制作的泛文化现象,我们将论题限定在“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上来。我们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放置在它与它的外围之间的“边缘地带”的研究,统称之为“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与当前国内外盛行的“文化批评”意义大体相近,而与“文化研究”的概念所指大不相同。“文化批评”的范围比传统的文学批评更广阔,研究重心依然在文学上,而批评的目的却超越于文学的审美性或文学性,成为一种文本政治学。但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它却常常越出了我国现代文学观念所确立的“纯文学”、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泛文学(或称“杂文学”,比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领地,而去研究广义的文学之外的





东西了——比如,研究麦当劳文化、波鞋(粤语,即普通话的“运动鞋”)、汽车时尚等。由于“文化研究”涉及面太广,本课题无法对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评判,我们将严格限定论题:对那些逸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跨越到非文学领域里去做出“越界研究”的学者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研究视点、研究方法加以汇总、梳理,对“他们”研究文学时导致的“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做出我们力求准确而详实的分析、梳理、评判与建议。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需要特别加以强调——是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的研究”之“研究”,是一种后设研究,而不想、不愿、更无必要在当前“众语喧哗”的学术界里,再去匆忙加入一种未必属于深思熟虑的姿态或“言说”,那种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而去强为之说的“言说”未必具有多少能够经受得起学理推敲的价值。

从本课题的研究角度来看,对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之学术史的清理和学理性的批判,才是“把文学理解当成本体与目的”的研究。至于文化研究,却是伸展到文学之外,目的在于讨论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化现象,文学不过是它的由头和躯壳,而且这躯壳也往往包裹不了文化的灵魂,文化常常“灵魂出壳”了。

我们需要先认真、准确、客观地下一番文献的、话语语境的考辨工夫,以陈寅恪先生所信守“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弄清学界在有关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什么条件下,又是针对什么问题、怎样针对具体问题言说的。弄清楚了这些看似琐碎又很容易似是而非的问题,才能够明确什么学人或学派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正确到什么地步。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确自己的后续研究是“对着谁讲”、“接着谁讲”、“讲到什么程度”。这是必须要加以明确的,否则,我们的学术批判就可能蜕化成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意见争鸣。那样的话,严谨的学术研究与个人化写作中的那些随笔、杂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陈寅恪的信条“要以同情的心态靠近真相”——即研究者先放弃自己的偏好,先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合理依据,完全理解了研究对象后,才以当代眼光重新做出合情合理的评断。研究中需要竭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只搜集、梳理并复述出准确的文献材料,不能或不愿加以深入分析思考;二是尚未占有尽可能多的可靠材料,就匆忙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预设出先验的“一得之见”。

本课题从“学术界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的界定”的角度切入论题,梳理了这一课题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然后从观念的泛化、态



度的迁移(比如,采用“抵抗投降”的方式来捍卫纯文学的崇高地位和纯洁性、以穿越文学壁垒的方式跳出去研究文化、把学者的身份作为看待彼此是否够格参与文学论争的依据、认定思想与学术的分化等)、兴起的国际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背景,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文学性”位移与其边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解构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人文精神与新理性、重写文学史、从文化诗学到经典文学理论,视图叙事与消费文化理论、文艺生态与批评九类学术论争,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学术主张与理路。随后,展开了我们的五项学术批判——研究重心之争与社会立场的分歧、能否回答新的文艺现象、视图形式是否凌越了纸媒文学、文艺生态是否可以提供人类中心与科技中心之外的第三种理论支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能成为当下中国有效的言说——以及建立在五项批判基础上的特定反思(发展的初始阶段,移植西方与本土适应的落差等)。由这些针对性非常具体而直截了当的反思,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四项具有共识性和可公度的评判——扩大学科视野的姿态、消解传统学科界域的努力、面临的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其中,克服上述缺失的出路至少有三条:第一条是走丰富、补充和完善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的道路。第二条则是坚持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坚持文化批评的多样性。第三条就是弥补彼此知识结构、才情结构的偏失,克服“眼高手低”、“说话不腰疼”的积习,倡导“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以上述四大评断为逻辑支撑,最后指出本课题研究者对文学研究新拓展的探索上两种道路和三个重心转向的设想。

就评判的可公度而言,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理论提供给人类一种新思路,一种新尝试的可能性。但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所标举的“双方都没有优越性、成见、隐藏的动机和信念”,“杜绝事先构想其目的和结果”。当社会群体分化到极端对立的地步,各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各执己见、不肯相让时,将会丧失彼此沟通的平台而无法达成“对话”。如果再次将文学的或艺术的理论推向体系化的道路,那么如何避免以一种新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取代旧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所留下的历史性荒诞?或者依据同样陈旧、封闭的思维方式变成另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思维循环怪圈”?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策略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中间地带形成一种扩展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做出系统的研究和康德式的批判：从中国本土发掘文学泛文化研究的案例，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语境相融合，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当下中国的共时态层叠，创生出中国式的泛文化研究的范畴、术语去参与国际对话。由此培植人类经验形态的新生，促进科际知识壁垒的破除，加强新的知识成果的整合，催动新文化形态的“凤凰涅槃”。

我们时下里从文学研究的阵地“向外”突围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尝试，大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常常是“非法逃票”地借用了另一学科的概念术语、方法视角来立竿见影、现炒现卖地充作“手术刀”，对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生硬地强施解剖。这样的跨学科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些言说方式和话语空间，借别的学科也是为了在文学中多显摆出一些“杂耍”。至于“所借用的学科知识是否被自己正确掌握”？这类问题却并未得到严格意义上的省思。所借用学科里的那些“正统科班”们是否认可也无暇顾及。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绝对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爱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都是破坏多于建设、解构甚于建构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似乎是由研究课题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里各自经受过正规严格训练而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集合为一个共同的攻关小组。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建设并不容易，但起码要比那些文学出身的人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拿来”后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操手术刀的做法，其学科意义之规范性、严谨性要高出不少。单方面地快速突击、“偷师学艺”而“拿来”的手术刀竟然可以十分自信地“宰割”那些原本有机天然或已经被扭曲阉割的文学，竟然不必为这种尚未取得“中西医结合门诊”执医资格就去做“宏大叙事”的大手术担心，竟然不必疑虑于可能旧伤未愈又添新恙。这种做法不仅有违“跨学科”的初衷，即便是对提升文学研究的水准、优化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和增强艺术心性修养的累进，都可能贻害颇大。

文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它赖以存身并发展的语境中。为了使文艺理论能够真正有可能成为

一门学科，就要穿透经典文学的语境，深入到具有现场性的、民间流动着的活态表演艺术中去，发掘孕育文学的生命之源。我们十分需要实现从传统经典诗学理论到文艺民间现场活动的表演诗学的转型，从当代民间依然活动着的艺术生命形态嫁接、生长出一种口传、表演、活动的诗学。那种经典文艺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以研究文人个体





创作中的经典文本为依托,以一元传统观念和范畴为圭臬,排斥流行文化,视民间的文艺形式为不入流的经典文艺理论,将转换为包涵有更多非经典文艺在内的总体性诗学——具有部分区域或被分层的欣赏主体所采纳,以研究同类群体延续的口传创作为依托,以交往对话理论为支撑,视民间现场活动为艺术浩瀚母床的总体性诗学。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性、普适性的大一统文学观支配下的文学研究,不仅与现代经典之间可能相冲突,而且与口头文学之间也常常缺乏可公度性。

在做出细致、严谨的考辨、梳理之后,笔者以为,解决这些困境的路径主要有两种总

的方向拓展和三个重大转变。两种总的方向拓展如下:其一,是在传统文学理论领域里发掘、突出一系列很有开掘价值而时下的学界较少去关注、较少沉潜下去深入探究的命题。比如,重复、差异、象征、通感、神韵、清空等范畴或术语的内涵,就非常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发掘、考辨、整理。传统的经典文艺学范围内依然有许多命题尚待开拓而非研究价值不再。其二,将严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而且集中于经典文本)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文本赖以存在的语境研究。这个语境有文本内的语境,也有文本外的语境。对文学文本的语境研究中,尤其需要加强的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了的口头流传的、现场表演的活文学,将我们的研究重心由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非经典诗学:民间的、民俗的、口头流传的艺术理论。在上述两种总的方向上做出拓展,将会实现观念与道路三个重大转变:一、将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转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学理论;二、将宏大叙事的理论指向转为非本质主义的主体间性艺术理论指向;三、与文人个体独创书写方式不同的民间群体“承传-即兴”兼有的集体创作道路。

实现了上述两个方向拓展、三个重大转变,将使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显著而十分有意义的改观。总括上述三个重大的转向后,我们至少可以将经典化的文艺理论归纳出如下两方面的特征:1. 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2. 理论旨归的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与之相反,非经典的文艺理论的特征将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价值指向:1. 非经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非客观性、非实体性、文本间性。2. 其理论旨归的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3. 以互动参与分享、交流播散交往为主要形式,避免意识形态文论以理论家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去评判事物。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彼此平等沟通的话语交往平台。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是一心想推



翻经典文艺理论并取而代之,它不是“非此即彼”而主张“亦此亦彼”,是为文学艺术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提供多种可能性。

采取“实”学+“诗学”+后设研究的建构策略,可以为文学理论研究揭窠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借助于对那些有中国民俗价值的文艺现象进行深入解剖,形成相似于巴赫金式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形态。



前 言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文化。

中国的艺术乃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艺术。

中国的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文学。

建立在这样一种生命文学基础之上的文学研究、乃至文化批评甚至范围更其广大的文化研究，天经地义就曾经是（尽管有曲折和中断）、现在是（尽管依然众说纷纭）、将来更有可能是一种无可限量的生命诗学。

当我们把文学乃至文化视为生命当然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本真、最自然、最具有人类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觉得文化就与人类生命同一，文学也就天然地寓于人类的生命之中。此时，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就有物我和谐置换的“天人合一”生命宇宙观（既非汉代董仲舒侧重的“以人合天道”，又非反其道的以天合人道）油然而生。此时，不存在文学与文化的对立，他们都殊途同归于生命之“道”。文学与文化都不过是万般神通的一、二“小术”，惟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才是“空空”的“大道”。执是之故，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实在不过是一个由学“术”而达致“求道”的无限过程。这种历程有一点儿近似于儒、道、佛、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们的精诚专一，刻苦修炼。但差别在于，我们的旨归是为了更好地考察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中的各类鲜活具体、生动真切的感觉、体验、启悟与深思，而不是为了脱离人世去超升到圣人、真人、“西天乐土”或上帝、真主、理式、绝对精神的彼岸世界。我们是现世的，而非出世的；我们的现世又是热爱生命、复归于生命那自然本真而鲜活迷人的活动过程，不是以伦理教化纲常（如儒教之类）为旨归的。所以，这样一种“入世修行求道”的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为了生命的存在更其亮丽、生命的价值更其高扬、生命的意义更其昭彰。所以，文学





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其研究方式本身就需要与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和鉴赏的现象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但他决不可以被误解为脱离文学活动、脱离社会现实,它不应该是迂阔、隔膜于现实的象牙塔。

但是,文学研究毕竟与文学创作活动不同(尽管笔者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一再提倡有似于王蒙的“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打通学院派与生活派的壁垒”之类观点)。虽然就本性而言,文学是超然于现实中共具体的实用功利之外的“入世”,具有其特定的独立自主性。但“文学本身”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里都承载或折射着人类社会中的经验、体验、感悟、风俗、民心,想让文学封闭为审美乌托邦的自律,难免缘木求鱼。文学研究触角应该伸展到哪里?应该说,是对各种文学现象活动(包括创作、鉴赏、制作、传播、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循一元论、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和宏大叙事,也需要对审美乌托邦、形式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乃至怎么理解都行的文学观保持足够的警觉。本课题的任务是对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研究中对泛文化现象的各类研究成果做出梳理、分析、评价和再探讨。质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批判是一种“对研究的研究”之后设研究、对理论的再理论,是对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清理与批判,考察对象限定在“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研究中对泛文化现象的各类研究成果”,考察的范围是“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考察时限设定在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晚期到2005年盛夏之间。研究的问题旁涉到由国外引进的理论批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等现象时,才会对那些相关命题做出简括而必要的论述;当研究的问题不得不追溯到90年代以前,我们才会力求对那些更早的源头提要钩玄。这样的学术研究积累,可能比之在当前泥沙俱下的“众声喧哗”中依靠“价值先行”而再度勉为其难地加入一己之“说”,更具有学术研究或学术史的价值。

在当前各家各派纷纷急于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以便宣示自己的存在,担心在话语爆炸的信息时代里被淹没无闻的时候,“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古人格言犹可垂训当世。与其眼热心躁地参与论争和喧哗,不如静下心来,细心搜集、阅读、整理、分析、比较在有关问题上各家各派是如何研究和论争、论证的,发现各自有助于学术积累、学术进步的因素,澄清各自遮蔽、忽视的理路、死角,挤压出学术泡沫和稗草,梳理、比较各自的贡献与不足,弥补、修缮而整理出一个力求较为完整、合理、充实的研究理路、方法、视界,展示出现阶段文学研究泛文化



现象界的成长路碑,则可以对文学研究的后续学术发展,提供一个文献的索引、阶段性成果的汇集、经验教训的某种总结、研究理路与方法的一种标识,研究进展的一个参照文本……

这种闹中求静的学术清理,这种甘于寂寞中做稳冷板凳的研究方式,注定了研究进展的烦琐、具体、枯寂、缓慢,是在淡泊、冷清中看取滚红尘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澄怀净虑、明心见性”。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圆融地相互交汇着的。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我们“五·四”以来分类明确的纯文学观念大不相同,它是一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其不足早已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痛诋。于是,在20世纪的文学转型中我们一直在延续着“五·四”以来文学观念的衍变样式。可是,“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19世纪中晚期的观念。当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一再颠覆先前的文学观念时,我们又感到了自己新文学观念的“老不中用”。于是,本来水乳交融的文学与文化,现在竟然对立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当一些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的人,把文学视为夕日黄花,他们逃离文学而去拥抱“文化”新欢。这种价值选择本来也是一种可供尝试的探索,其间充斥着得失、利弊、因革,乃至研究者身份、价值、立场与观念的复杂状态。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平心静气地加以发掘、梳理、评估、再度开发。但现在,对“文化”的界定远超过一万种之多。终于出现了一种文学被泛化的偏向,什么都是“文化”,甚至文化也被泛化了。甚至许多反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与人道天伦的畸形状态、灭绝人性的特异行为只要一旦冠以“文化”一词修饰于后,再低劣、再粗俗的东西也都可以冠冕堂皇地成了公众面前可以不厌其烦而毫无羞赧地大讲特讲的“文化”。比如什么“行为艺术”、“天体运动”、“厕所文化”,乃至连语法和逻辑都不通的所谓“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这种种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现象,当然也就进入了“文化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的视域。它们猎奇矜异、不同凡响,时或凭题目的惊人耳目赢得“收视率”、“上镜率”、“注目率”。但是,当我们沉下心来深究它们的时候却发现,一而再地以偏执的心态、煽情的笔调重复拷贝,为了眼球经济而挖空心思制造卖点的暴露隐私写作,这些个写作活动能有多大的文学意义?这样的文学研究又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意义?那些大量充斥于“另类”社会生活和亚文化领域中的“意义”里有多少是可以通过逻辑上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可以互逆推理而能够得到证实或证伪的?经得起这样的检验之后,剩下来的成果里,将会有多少能够成为





相当程度上具有一定可公度性的言说或命题?我们常常听、说、读、写到大量的言说与文章,其中有不少颇具煽动听众(或读者)情感、情绪之才,但是细加推究,却发现那些东西其实是一些颇具小聪明的、光怪陆离的“意见”、“姿态”、“立场”或“偏爱”,却很难用它们顶替、纳入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层面去精审地拷问。于是,我们真的非常迫切地需要掂量一下,在时下“众语喧哗”的文坛学界,各种“意见”、“姿态”、“立场”、“身份”、“旗号”们,其正面建设的意义和负面破坏的价值究竟如何,严肃的学人将不能不反思我们的学术存在、学术意识、学术价值、学术生命等核心问题!

因此,笔者试图摆脱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又不肯一相情愿地返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里去。希望立足于当下新涌现出的众多文学新景观(包括一些“新体”、“变体”和“另类”)来重新思考什么是当下状态以及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那种“文学”,然后再从那种新颖而开阔的文学视界出发,看取当前的“文化研究”热。概括地说,笔者的研究是:先在新潮文化景观中看取文学,再以开放的文学立场、视角、价值尺度评判当下的当代文化。在做出这种回流互动研究的同时,试图对一些文学现象做出切实的个案分析。这样做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和那些耽于体系建构却“剪裁”、“忽略”人类实际境遇的先验设想、主观立论、从概念到概念的“价值先行”研究道路相区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层面,老老实实地做一些自己能做出一点点特色的研究。有多少积累和水平就做多少研究,占有几多“第一手材料”就只说几多话,至于此外更大的空间,不是不可以涉猎、推导、猜想——笔者也在做这种努力,以避免“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但所有的推导都要极为谨慎小心,要有可靠的语境与文献两方面的充分依据;不得不做出判断时,也尽可能指明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采用特称判断或单称判断,尽量不用全称判断或“全知的上帝叙述视点”。这样做既是为了尊重事实,也是力求避免在学术上歧途丛生。另一方面,当笔者看到我国大陆许多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研究后,往往是要么翻译西方最近时期的理论成果或个案分析,要么借用西方新观念来泛泛地谈一些在我国当前社会条件下与文学甚少沾边的“文化”。而且那个文化既“大而无当”、无边无涯,又毫无定性、随时可圆可扁,令认真到“犯傻气”的我辈不才学人不知该怎样着手和他们坐实对案。笔者一直在想,当前正在“热”头上的文化研究,如果不能拿出一批扎扎实实的成功个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示范于人——供人们鉴赏、批评、揣摩,就很难在当下的





中国扎下根来。当年,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学未必就比梁启超、黄遵宪的“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卓越到哪里去。如果不是杀出一个鲁迅,用《狂人日记》证明新文学的“实绩”,两位务虚的理论旗手单凭宣言和那本《尝试集》之类的打油诗就想把“文言文”扫出文场,怎么可能呢?所以,提供扎实、深入、厚重的个案“实绩”,在当前大陆学界就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于人文学术的价值有类于《大明统一志》的撰写者所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那样的抱负。

本课题从六易其稿申报立项,到立项后进入实施阶段,总体构思又有六次大的脱变更新。具体到每一篇在写作中的“自我否定”,反复修改的文本最多有十二种。依据近年来本研究领域的最新态势,重新设计了课题的整体框架,更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式,加深了国内外对本课题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与提要钩玄。笔者坚持一项治学原则:在客观、准确地陈述各家各派的观念、学说、理路、方法之后,才可以获得由我们去“接着说”的资格,力求采用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时留给后人的名言“要以同情的理解”心态去靠近真相。这种“同情的理解”就是研究者先放弃自己的偏好,先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合理依据。当研究者完全理解了研究对象之后,再以当代眼光重新做出合情合理的评断。

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笔者竭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只搜集、梳理并复述出准确的文献材料,不能或不愿加以深入分析、辨别、证伪,仅仅以“信”为能;二是尚未占有尽可能多而信实的材料,就匆忙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先验预设出“一得之见”,匆忙宣示自己的学术存在(其实只能说是一种观点或意见,尚不能称之为学术),最后证明的都不过是在证明之前自己就已经“构想”出来并偏爱有加的观点。至于这种“预先”就构想出来的观点是否经过反复证明或证伪?其依据是否就像他们所宣称的符合科学、理性?是否在“一拍脑袋,灵感就来”的情况下被“预先构想”出来?倘若如此,就可以断定,其立论或学术展开的初始出发点上其实也是非理性的。自己已经无心或有意地违反了理性,却希望自己后来的工作“理性”起来,与此同时,却要求别人的研究则从始至终严格坚持理性,这岂不是有违学术之道?接下来,犯的错误自然是已经沿袭了几十年的斯大林式老套——宁可用理论剪裁现实,也不用现实纠正自己“早先”已经得出来的理论观念。避免上述两种学术偏向的道路似应致力于“实”学+“诗学”的双向建构。

在这一探索历程中,由跟踪国内前沿到跟踪国际前沿,从跟着人家





说到和人家最新的说法展开对话;从反思、检讨当今学术前沿,到发现并自我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从热衷国际前沿对话到反省中思考为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提出有学理依据的策略和走向;最后确定为“对当前中国大陆文学的泛文化研究(梳理、考辨、探渊、分析、论争)”之研究,即是说,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不是当前发生的文学现象界,而是“对文学现象界已经做出的研究成果”的后设研究。本课题梳理了对文学研究做出泛文化研究取向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论争之后,做出我们的学术批判。在学术批判之后,又提出我们对这种研究的反思。然后,笔者将文学研究界出现的泛文化趋向概括出四项具有可公度性的共识:扩大学科视野,消解传统学科界域,面临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最后概括出拓展与深化文学研究的“两个方向转型”和“三个重大转变”。

本课题原来的指导思想是试图剑出偏锋,以特异来求得一席之地,惶惶地力争赶到学术的前沿去对话。笔者提出“六新”座右铭:新命题、新观念、新思路、新角度、新方法、新材料。但在课题实施中品尝够了辛酸苦辣后,现在颇有些“反朴归真”的况味了:其实,能了解清楚研究对象实际上究竟怎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有准备地立出新说,这种新说也应该“脚踏实地”,不能夸奇矜异而与实际或学术规范渐行渐远。为了新奇出众而刻意别立新说,那样偏执的研究动机反倒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误入迷途”而偏离实际状况甚远。

鉴于文学泛文化现象中扩大学科视野、消解传统学科界限后暴露出的一系列缺失,文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它赖以存身并发展的语境中。为了使文艺理论能够真正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就要穿透经典文学的语境,深入到具有现场性的、民间流动着的表演艺术中去,探究孕育文学的生命之源。在这样的探究中,需要秉持“从文艺的角度看取文化,再从文化的角度反观文艺”的研究立场和双向互逆(充分且必要)的研究视角,来发掘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及其引人深思之所在。

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人生中或文学史上的一个个照片的片断,而非真实的全过程。文学史应该研究的其实是文学真实的流动与写作的活动。民间口头的、现场表演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史,那些文人加工后“雅”化的资料文献、官修钦定本不过是历史中某些片断的标记,是被遗忘、忽略、遮蔽或虚构了的伪历史及其想象。我们需要依据这些“证据”、文物、编年,通过穿透文本的“精神回溯”,重构、激活那些流动





在历史中的记忆。

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持有的态度则是:有多少积累和水平就做多少研究,占有几多“第一手材料”就只说几多话。至于此外更大的空间,当铭记维特根斯坦的名句——“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应保持沉默”。这样做既是为了尊重事实,也是力求避免在学术上歧途丛生。

在做出细致、严谨的考辨、梳理之后,笔者以为,解决这些困境的路径主要有两种方向

转型和三个重大转变。两种方向转型如下:其一,是在传统文学理论领域里发掘、突出一系列很有开掘价值而时下的学界较少去关注、较少沉潜下去深入探究的命题。比如,重复、差异、象征、通感、神韵、清空等范畴或术语的内涵,就非常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发掘、考辨、整理。传统的经典文艺学范围内依然有许多命题尚待开拓而非研究价值不再。其二,将严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而且集中研究经典文本)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文本赖以存在的语境研究。这个语境有文本内的语境,也有文本外的语境。对文学文本的语境研究中,尤其需要加强的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了的口头流传的、现场表演的活文学,将我们的研究重心由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非经典诗学:民间的、民俗的、口头流传着的文学艺术理论命题。在上述两种总的方向上做出拓展,将会实现观念与道路上的三个重大转变:一、将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转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学理论;二、将宏大叙事的理论指向转为非本质主义的主体间性艺术理论指向;三、与文人个体独创书写方式不同的民间群体“承传-即兴”兼有的集体创作道路。

实现了上述两个方向转型、三个重大转变,将使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显著而十分有意义的改观。总括上述三个重大的转向后,我们至少可以将经典化的文艺理论归纳出如下两方面的特征:1. 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2. 理论旨归的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与之相反,非经典的文艺理论的特征将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价值指向:1. 非经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非客观性、非实体性、文本间性。2. 其理论旨归的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3. 以互动参与分享、交流播散交往为主要形式,避免意识形态文论以理论家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去评判事物。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彼此平等沟通的话语交往平台。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想重复西方思想史的怪圈——后起的理论一定要推翻前代理论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然后再等着更后起的理论来推翻它,最终僵硬地进入学术史陈列





馆。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是一心想推翻经典文艺理论并取而代之,它不是“非此即彼”而主张“亦此亦彼”,是为文学艺术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提供多种可能性。

本课题从“学术界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的界定”的角度切入论题,梳理了这一课题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然后从观念的泛化、态度的迁移(比如,采用“抵抗投降”的方式来捍卫纯文学的崇高地位和纯洁性、以穿越文学壁垒的方式跳出去研究文化、把学者的身份作为看待彼此是否够格参与文学论争的依据、认定思想与学术的分化等)、兴起的国际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背景,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文学性”位移与其边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解构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人文精神与新理性、重写文学史、从文化诗学到经典文学理论,视图叙事与消费文化理论、文艺生态与批评九类学术论争,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学术主张与理路。随后,展开了我们的五项学术批判——研究重心之争与社会立场的分歧、能否回答新的文艺现象、视图形式是否凌越了纸媒文字、文艺生态是否可以提供人类中心与科技中心之外的第三种理论支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能成为当下中国有效的言说——以及建立在五项批判基础上的特定反思(发展的初始阶段,移植西方与本土适应的缺乏等)。由这些针对性非常具体而直截了当的反思,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四项具有共识性和可公度的评判——扩大学科视野的姿态、消解传统学科界域的努力、面临的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克服缺失的出路至少有三条:第一条是走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的道路。第二条则是坚持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坚持文化批评的多样性。第三条就是弥补彼此知识结构、才情结构的偏失,克服“眼高手低”、“说话不腰疼”的积习,倡导“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以这四大评断为逻辑支撑,最后指出本课题研究者对文学研究两种道路和三个重心转向的设想。

提到评判的可公度性问题,就不能不提及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与对话的交往行动理论。其实,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学说是提供给人类一种新思路,一种新尝试的可能性。但是,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却很难做到“双方都没有优越性、成见、隐藏的动机和信念”,“杜绝事先构想其目的和结果”(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语)。当社会群体分化日益严重,甚至到了极端对立的地步,各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各执